

八十回憶 (二)

● 孫雲燾 (國立台灣大學名譽教授、中華藥學會名譽理事長)

父親正直母親聰慧

我的故鄉是江蘇省高郵縣。高郵位於江蘇省北部運河西岸，東邊面臨高郵湖，在江都縣(揚州)以北一〇六華里，是一個魚米之鄉文風頗盛之地。北宋時代，鄉賢如秦觀(少游)，孫覺(莘老—黃庭堅的岳丈)等在當時都極負盛名。他們和蘇軾(東坡)，王定國輩都很友好，常遊當地的文遊台，飲酒賦詩，讌飲樂甚，直到今天文遊台依然存在，留有諸名人筆跡刻石，作為紀念。

再有清代經學大師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也是高郵人，他們的精心著作多種如經學、文字學、訓詁學和考據學等名著備受學術界重視。王氏父子勤奮求實，鍥而不捨的治學精神和方法，是後人治學的楷模。王氏故宅在高郵城內西後街，他家門前豎著一根旗竿，我們稱王家是「獨旗竿王家」。每當我們走過王家門前，總懷著無限景仰之情。

自從隋代開鑿大運河由京城(北京)直達浙江杭州，這條水道便成為古代南北交通的孔道。高郵不僅是運河中段的一個重鎮，同時也是陸路

交通上的一個重要驛站。等到京浦(北京到南京對面浦口)鐵路通車以後，運河的重要性才降低了。今天從高郵經運河南下到鎮江，便可和滬寧(南京到上海)鐵路銜接，所以對外交通也十分便利。

我的家庭可算是一個中等家庭。父親殿丞公字右佳，清代秀才，民國以後，還讀了杭州浙江法政學校畢業，好學深思。王氏和丁氏母親生我們兄弟六人和姊妹一人。王氏母親生大哥雲鏞，二哥雲濤和二哥志戎。丁氏母親生我(雲燾)，妹雲軒，五弟雲疇和七弟雲壽(六弟是義子)。我們兄弟名字是以「雲」字排行，名字第二個字是屬「壽」字部的字。三哥原名「雲疇」，後來因改名「志戎」，就把「雲疇」名讓給五弟了。父親是一位正直的讀書人，待人謙和厚道。鄉里的人喜歡稱我父親為「順治錢」，那意思是「又大又厚」。從他四十歲過後還進法政學校和年輕人一齊讀書，就可見他老人家抱持新觀念，重視學業一斑了。我們兄弟姊妹都能受到高等教育，實在是拜受雙親的恩賜，也是我們繼承到的最大資產。

我的二姑丈宣公子野喜愛金石古董，尤以瓷器收藏豐富見稱，後來成為上海收藏名家之一。他家原在高郵城內有一座祖產住宅，那可不是普通的四合院，而是從大門到後面正房，前後有六進房屋，東西二側還有花園，是一所共有大小房屋六十九間的大宅第。他因為要遷居到上海去拓展他的事業，才要出讓住宅。可是在從前時代，誰家子弟要出賣祖產房屋乃是一種極不名譽的事。於是二姑丈便以半送半賣的方式把住所房屋讓給我們家。實際上，我們家祇是一個中等家庭，並非富有，所以住進這所大宅第，常被別人誤認我們家是一個富紳之家。因此雙親便告誡我們，切不可自以為是富家子弟，也不可驕矜，要好好讀書上進，以求自立。我父親居家恒以讀書自遣，從不過問家鄉事務。但對投資房產，興辦實業倒也感興趣。可是秉性忠厚的人，對於事業的經營和管理實非所長。結果投資的多項事業都遭受虧損，被別人騙去了不少錢財。

我的生母丁氏名錕，字劍鳴，是外祖父丁公又錢的二女。外祖父是清代拔貢，曾在廣西省做官，詩文極好，母親幼承庭訓，知書識禮。年輕

時除學習女紅、烹飪、紡織、剪紙以外，還學過英語，和製造肥皂、蠟燭等化工技藝。母親平日持家勤儉，但對子女的讀書費用，卻從不吝惜。常常鼓勵我們不僅要大學畢業，還要出國深造。弟弟們要學習哥哥的榜樣。母親聰慧，富有機智，且具備膽識和愛國心。在抗日戰爭中高郵城淪陷時，有一位部隊的文書，平時就受到母親的關注，他因為來我家通知縣城失陷消息而不及撤退，當時處境十分危險，母親要他留下，不顧自身的安危，面對來搜查日軍的刺刀，毅然承認他是自己的孩子。等到日軍去後，又發現家裡還躲藏著四個中國士兵，幸而未經查到，真是驚險萬狀。母親隨後設法幫他們化裝，逐一逃離縣城，轉移到安全地帶去。事後我們知道這個動人心弦的故事，真是感嘆不已，更認識了母親的偉大！母親也得到上天的保佑，活到九十四歲才逝世。

模範大哥精研地質

我們家有一個傳統，就是哥哥要照顧好下面的弟弟讀書，不用父母操心。大哥雲鑄是我們家兄弟讀書求學的模範，他在國立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後就留校擔任助教，追隨在北大任教的美國古生物學家葛利普氏（A.W.Grabau）學習，學業乃見銳進。後來地質調查所派大哥到德國哈勒大學深造，於一九二七年獲得理學博士學位。在他未到卅歲時即已擔任北大古生物學教授，並且一直在北大地質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多年。他專門研究中國寒武紀和古生物三葉蟲在各地層分布地帶的關係，很受地質學界的重視。我們兄弟喜歡

稱他為「三葉蟲大哥」，以示親熱。他有時也給我們看那藏有蜘蛛或其他昆蟲的琥珀。現在我身邊仍然收藏著幾塊三葉蟲化石，也表示對大哥的懷念。大哥和我們一齊去旅遊的時候，便講些「滄海桑田」的故事。他還告訴我們：宋代理學大師朱熹朱夫子看到山峰起伏之狀，便推論古代地殼是由半流體的岩漿凝固形成。這是我們古代學者最早有地質學觀念的事例。

大哥在地質學方面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是我國古生物學的奠基人，他注意古生物學和地質學的綜合研究，提出畫分地史時期的原則。還有他發表「海相對地質形成的影響」研究報告也引起各國地質學家的讚許。他曾被選為國際古生物學會副會長（一九四六——一九五二年）。大哥也是一位地質學教育家，他能發現人才，培育人才，使北京大學地質系不僅聞名全國，而且蜚聲國際。他每年都要做一二次地質旅行，走遍全國荒山僻野，並且足跡遍及世界各大洲。他出國回來，常常帶給我一些外國錢幣，引起我收集中外錢幣的癖好和興趣。

在民國初期，大家著重研究的新學是地質、礦冶、農、工等學科以求福國裕民。二哥雲濤大概是受了大哥的影響去國立北洋大學攻讀礦冶。

他平日勤奮讀書，連連跳班，結果他還比大哥早一年自大學畢業。二哥在湖北及東北吉林省多處煤礦擔任礦工程師。二哥的一生受婚姻的影響很大。他早年結婚，因二嫂生瘡，也感染了皮膚病，以致失去出國深造機會。二嫂是富家獨生女，性情驕縱，不僅二哥沒有得到幸福生活，而且還

影響了我們整個家庭的和諧。

兄妹組成醫療聯隊

三哥志戎原打算從軍報國，去進黃埔軍校，後經人勸阻，才去學醫。先入湖南長沙湘雅醫學院，後轉上海聖約翰大學醫學院畢業，並獲得美國賓州大學醫學博士學位。他在醫院服務幾年後便到衛生署工作。三哥對公共衛生方面的寄生蟲病防治工作較有研究，曾奉派到印度去研究黑熱病（Kala-azar）的防治，後來又到美國考察公共衛生。在對日抗戰以前時期，蘇北、魯南一帶地區黑熱病猖獗，其為害之烈不亞於吸血蟲病。三哥在江蘇淮陰（清江浦）成立衛生署黑熱病防治處，展開黑熱病防治工作。經他悉心研究，發現我國黑熱病係由中華白蛉（一種蚊類昆蟲）所傳染，於是在防治工作上，有了重大的突破。抗戰後期，滇緬公路是抗戰後方對外聯繫的唯一國際通道。但沿途荒涼，疫病流行，特別是瘧疾為害最烈，正如早年中美洲開闢巴拿馬運河時的情形一樣，三哥擔任雲南省防疫大隊工作，經常往來邊區各地努力防疫工作，頗著成效。抗戰勝利後先後在河北醫學院及青海醫學院擔任公共衛生學教授。

我和三哥最接近，彼此相處在一起的時間較多，受他照顧的地方也最多。三哥在聖約翰大學有一位要好的同學姜渭倫，他的哥哥姜謂生是在美國修讀藥學的。於是三哥便建議我也修讀藥學這一科，就這樣我便進入中法大學藥科就讀。雲軒妹因為在父親生病時侍奉湯藥，就發願學習護



②劉瑞恆（中排左二）林可勝（中排右三）早年在貴陽與外國醫藥軍官合影（文見本誌三二四期三四頁）。

①作者的老長官行政院衛生署長金寶善（右二）早年在南京與友人合影。



理以便能用愛心來照顧病患。於是我和三哥，軒妹在家庭裡就組成了一個醫、藥、護理聯隊。軒妹對基督教十分虔誠，並且還到神學院去進修。她可以不看講稿，能講道一、二小時並答覆詢問，可見她對教義瞭解得十分透澈。她的夫婿林國光（疑今）專攻英國文學，留美得文學碩士，譯著很多，任國立廈門大學教授兼外文系主任。林家是一個基督教家庭，國光妹婿的祖父是一位牧師，他的父親行二，林語堂大師是他的五叔。

雙親培植優異表現

我的父親做事慢條斯理，不急不躁。他老人家談起當年赴考往事：當他寫好文章，還未及將最後一首詞謄好時已到收卷時間，不料這份不完整的考卷選中了秀才。我的五弟頗受父親遺傳的影響，他做事也是按部就班，一絲不苟。我和五弟的面貌有些相似，行動也都是「慢動作」。我對五弟求學的事特別關心。最初他勉強同意去念農業經濟，不料他在南京金陵大學已經註冊之後，忽又改變主張，決定離開南京北上到國立北京大學去改念政治經濟。他在北大畢業後，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返國後因政局影響，才改習圖書館學，擔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學及資訊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我覺得五弟從事圖書館學工作比較適合他的個性。

我對么弟雲壽關懷深切，但照顧得最少，時時引以為疚。七弟在抗戰中長成，因此在生活和求學過程中，都遭受到不少艱難困苦。他從國立中央大學畜牧獸醫系畢業後，便專攻神經生理學

，追隨生理學權威吳襄教授多年，發表研究論文多篇，獲致最高評價。現在大連醫學院擔任生理學教授。

父母告誡我們兄弟姊妹要相互友愛，我們在家裡也從不爭什麼。各人都按著本分去做自己的工作，沒有辜負雙親對我們的培植和期望。我們兄弟六人都受到高等教育，其中獲得博士學位的三人，碩士學位的一人，學士學位的二人。除二哥是煤礦總工程師外，其餘五人和女婿一人都是大學教授。我們的子侄輩也有多人擔任教職的，其餘在各行各業中，也都有優異的表現。我盼望我們家族能代代薪火相傳，瓜瓞綿綿！

啟蒙教育回味無窮

我進小學以前的啟蒙教育是私塾。在私塾裡不是從小學課本「人、手、足、刀、尺」讀起，而是先念三字經，千字文，然後論語，孟子，幼學瓊林等。像「三字經」起頭是：「人之初，性本善」一開始就講人性。「千字文」起頭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又是講宇宙。像這樣深奧的文章，實在不易引起稚年兒童的興趣。難怪俞大維資政推往成人去讀「三字經」，也頗有道理。我記得當初念論語時，還連帶念朱（熹）註。例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朱註：「說，悅同。學之為言效也。習，鳥數飛也。」現在坊間已經找不到有朱註的論語了。這差不多已是七十多年前的往事，如今還依稀記得。不過，也就祇記得這一句而已。我覺得「大學」「中庸」和「論語」都是說教太多，過於嚴肅，讀起來

比較枯燥乏味，不如「孟子」常用故事式或問答式體裁論說，較為生動有趣。「孟子」中有好多篇文章的意義也較適合時代思潮。孟子生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說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種民本思想的言論，真是了不起。想到「孟子寡人章」中的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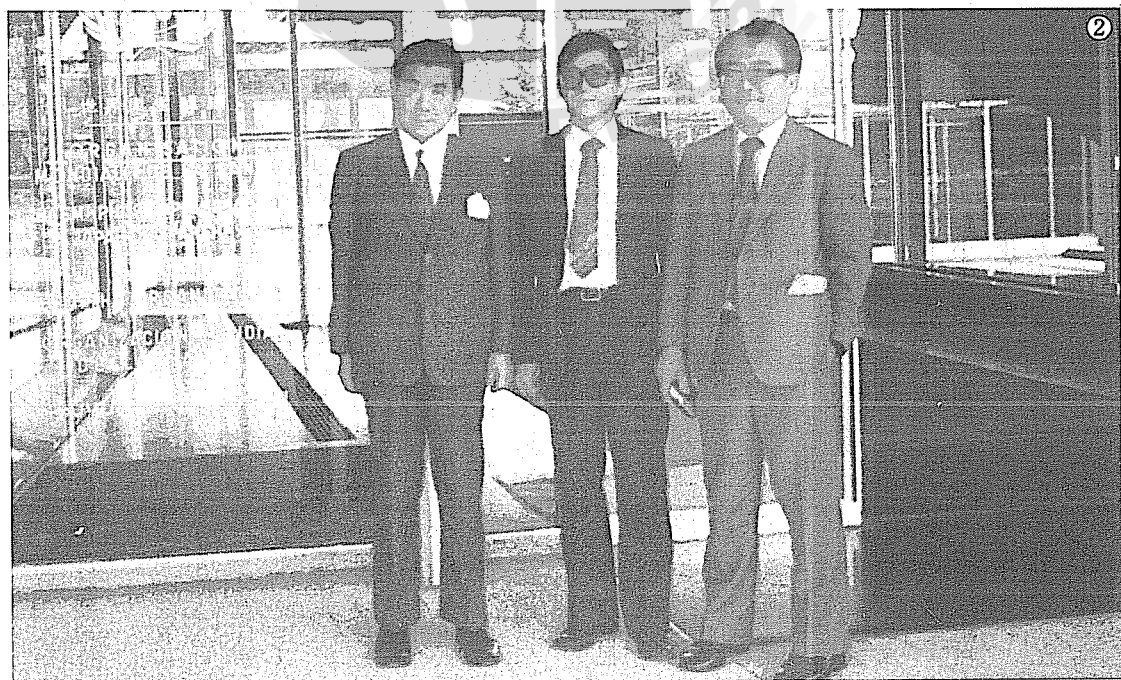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這是孟子推行王道的說法，但也是治國之道和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如此文義淺近，以世事為例，自使初學者易於瞭解和接受。又如「孟子齊人篇」是一篇寓言文章，描寫齊人有一妻一妾，他瞞著家人出外乞食，回來還驕於妻妾的那種苟賤形態，真是維妙維肖。這是借齊人警覺世人求富求貴不知羞恥的醜態，讀來非常有趣。今天對有小妾的人，說他有「齊人之福」反把「齊人」的名字提昇了起來，成了有「艷福」的人了。我覺得在四書之中，「孟子」一書的辭句較為明易，使初學者容易探求，便於體會。我總記得源出孟子的許多成語如：「揠苗助長」，「五十步笑百步」和「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等等，都有教育的深長意義。

再有早年讀了「龍文鞭影」類的故事書，便知道「江郎夢筆生花」，「江郎才盡」的典故



① 作者孫雲燾一九四〇年在中法大學藥科任教時留影。
② 左起：作者孫雲燾教授、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黃文鴻局長、台大陳瑞龍教授在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總部門前合影。



，而不是從史書上得來的知識。故事主人翁江淹少年時才華英茂，尤以他所寫的「別賦」婉約動人，倍受世人讚賞，因此受任為光祿寺大夫。後來他年歲增長，文思衰退，寫不出錦文佳句來，於是他便說：「少年時夢見神人授以五采文筆，所以，文思大進。後來神人又來索回采筆，便不能再作出好文章了。」他的說法竟然獲得多數人的同情和感嘆。於是世人乃說：「江郎才盡了。」但時至今日卻使我印證到現代問題上而發生聯想。在近代二十世紀裡，竟有二位享譽國際的文學家在不同方式下結束了他們寶貴的生命。日本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衰老了，文才也衰退了，但他對渴望的文學卻永遠未得滿足。他打開煤氣爐，深深的吸氣，安詳地了結他的一生。美國大文豪海明威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可是他受了盛名之累，在他得獎後雖然仍舊繼續寫作，可是愈寫愈糟，真是力不從心，徒喚奈何！他是用鎗自殺的。我覺得他們二位都沒有我國南朝梁代那位江淹大夫來得聰明豁達。像他把文才衰退的事委之於「失去了五采文筆」的托辭，讓當代以至千古以下的人都受了他的欺騙而不自覺！我敘述這個故事旨在說明我們早年知道的知識，等到年長以後，經過咀嚼回味，自有一番不同滋味。

插班小學銘記校訓

一般上了年紀的人，常常對於近期的事容易遺忘，但對早年的一些瑣事可能還記得清楚。這是所謂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的不同。長期記憶是

經過選擇、過濾、複習、緩衝這些階段，因而記憶較為深刻。關於語文和一些基本知識，實在不宜放棄精讀，熟讀方法。從前我國許多有名學者都在十二、三歲時便已讀過了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易經、書經、詩經、禮記、春秋），打好國學基礎。今天雖然情況不同，但讀書求知，應在少年時代打好基礎，這是千古不變之理。英國和法國的中學校嚴格教學生學好語文，理則學，和道德規範，很有道理。因為在幼年時候，記憶力強，學習語文，比較有效。有了良好的語文基礎，能寫能講，再研讀其他專門學問，就能應付裕如了。試看我們好些學生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念了多少年國文、英文課，還是不能寫得通暢，不能講得條理分明，把意見充分表達出來。這應該不是教課時間不夠的問題，而是未能應用良好教學法所致，所以把許多時間浪費掉，而沒有收到良好效果。

在我的回憶中，私塾的教師雖不理想，但也可使人強記一些字彙和詞句。我受教的那位張子揚老夫子是一位出名的嚴厲老師，他督導學生課業，認真嚴格，使學生有敬畏崇敬之心，不敢有所懈怠。我在私塾讀了二年，便轉到小學插班。民國十四年夏季自高郵縣立第一小學畢業。縣立第一小學的校園廣大，師資優良，教學認真，算是縣內首位小學。當我讀六年級的時候，學校初次採用美國「道爾頓制」教學法，以六年級為實驗班。規定上午講課，下午即自行在課室內做習題，也有老師在場督導，解答問題。等功課做完以後，便是自己的時間，可以自由去做課外活動

了。我們這班同學都對這種新引進的教學法感到興趣。那是一種自動自發，啟迪式的教學法。後來不知為何這種「道爾頓制」教學法沒有繼續推廣下去。

我記得在小學時，每天參加朝會要唱國歌和校歌。早期的國歌是「卿雲歌」，源出尚書，詞曰：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且復日兮，日月光華，且復日兮。「卿雲」意為慶雲，或作景雲，古人以為是瑞氣。據史記載：「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謂卿雲」。可惜「卿雲歌」歌詞的意義過於深奧，難以瞭解。原文祇有四句，後二句又重複一次，一共也祇有六句，仍嫌太短。再有唱起來聲調低沉，不易使人精神振奮起來。「卿雲歌」大概是民國以來第一首國歌。後來的國歌有「中國雄立宇宙間：：」「我中華……」等等。直到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莫都南京以後，才用現在的國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此外，高郵縣立第一小學所譜校歌的詞和曲調都很不錯，歌詞如下：

淮南第一，廣廈宏開，珠湖秀氣映文台，
，有多少英才，磊落其懷，從「勤勞、忍耐」訓中來。

註：「珠湖」指高郵縣東邊的高郵湖。「文台」指高郵古蹟「文遊台」。

我對小學校訓：「勤勞、忍耐」，時時銘記在心。後來見到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書墨寶：

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總在能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



②一九八八年作者孫雲燾（右四）率領代表團在澳洲雪梨參加國際藥學科技會議合影留念。
①作者孫雲燾（左）偕美國南加大連榮吉教授（右）拜會陳立夫資政（中）。



對孫中山先生名言國人任事要堅忍耐煩，勞怨不避，留有深刻印象。

上海求學憤怒萬分

民國十二年北京的黎元洪總統被直系軍閥驅走之後，軍閥曹錕部署賄選總統，竟於十月五日賄選成功，當選為總統。於是全國一致聲討曹錕賄選。消息傳到高郵，我們小學生也開會反對曹錕賄選。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我們得到消息後，列隊到縣立體育場參加追悼會。

在小學時代，我喜歡閱讀的課外讀物有古文觀止，唐詩，唐人小說，西遊記，水滸，三國演義，老殘遊記，包公案，施公案，福爾摩斯偵探集等。這些讀物都是在課餘的時間閱讀的，有時也看得很入迷。我在小學畢業後便到上海進中學，先讀民立中學，後來轉入浦東中學。民國廿二年中法大學藥科畢業後，到民國廿五年才離開上海前往法國繼續進修，計先後留在上海十一年（民國十四年至廿五年），可算是一段不短的時間。

上海是位於長江出口處，黃浦江邊的一個國際商埠。清代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後，我國和英國簽訂江寧（南京）條約，除割地賠款外，並開放五口通商（上海、廣州、廈門、福州及寧波五地）。上海便是在簽訂江寧條約後開放為通商口岸的。上海縣市管轄華界地區。租界包括所謂「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公共租界內滬北虹口地區乃是日僑聚居的地方，是

日本人的勢力範圍，等於是「日租界」。其餘公共租界範圍內大部分是英國人的勢力，等於是「英租界」。租界內外國人有權可以駐兵和享有領事裁判權，這等於是中國境內割讓給外國人一塊土地。租界的最高行政機構是工部局，警務由巡捕房主管，巡捕擔任維持治安任務。租界當局簡直把租界裡的華人看成殖民地人民，常採取高壓手段施政。

我從家鄉初到上海，感覺到身為中國人，卻處在次殖民地國民的地位，才驗證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所說的話，實在悲憤不已！再看租界裡的國人，倒是終日照熙攘攘，忙碌異常，並沒有什麼羞辱之感。上海外灘地帶位於黃浦江畔，是海關大廈，英商匯豐銀行等金融機構所在。各型大廈林立，形成上海的特區。那裡英國人開設的華懋飯店（旅社）不准中國人進入居住和用餐。外灘公園（在外北渡橋塊）入口處豎立一塊牌子，上寫：「狗與華人不得入內」，真是侮辱至極，看了真令人憤怒萬分！後來經人不斷在牌子上丟擲油墨，瀝青等，方始除去。所幸我就讀二所中學都在華界，我們立意非萬不得已決不進租界（例如要到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買書才非去不可）。因此，我特別敬重地質學家丁文江，他是一位具有強烈愛國心的學者。他在上海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當總辦的短期任內，就擬訂了「大上海」計畫，其目的在設法發展租界外圍地區成為新商埠，要把租界扼殺，使其逐漸萎縮，失去它的重要性。後來抗日戰爭勝利後，我們終於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復了上海的租界。民

國卅六年上海市政府推行江灣區的「大上海」計畫，就按照了丁文江的原訂計畫實施的，可見丁文江具有卓見。此外，丁文江在早年不利情況下，竟能於短短三個月內和租界當局達成協議立約，將上海租界內的會審公廨，改為江蘇省上海臨時法庭，首先從租界內收回我國司法主權，這也充分顯示他的高效率辦事能力和卓越行政外交才能。這些都是別人不能辦得到的事，而丁文江卻做得有聲有色。

志趣不同轉學浦中

民國初年上海有三所有名的私立中學，那是浦東中學，民立中學和澄衷中學，後來省立上海中學也相繼成名。民立中學注重文科教學，浦東中學注重理科教學。早期海關，郵政方面人員待遇較為優厚，而且職位也較安定，所以要想進海關或郵局工作的人便去念民立中學。我初進民立中學讀一、二年級時，除國文外，其餘課程都用英文課本。在英文方面有特選英文讀本，納氏文法，其餘的如中外地理、歷史、數學（注重簿記），道德規範等都英文講授，而且老師用上海方言講課，起初根本無法聽懂，祇有勤翻字典，真是苦不堪言。老師在下一堂課開始時，就點名叫學生站起來誦讀一段課文並作解釋。老師隨時校正發音和糾正解釋文句的錯誤。每週還要繳中英文習字。大體說來，教學還相當嚴格。我在民立中學讀了二年，因為志趣不同，即轉入浦東中學。浦東中學是楊斯盛先生創辦。楊斯盛在上海開埠時，從事建築業，白手起家。他因為自己失

學，所以便在他的家鄉浦東六里橋（上海黃浦江的東岸）創辦一所中學來回饋鄉里。楊斯盛辦學時即成立基金會支援學校經費，聘請知名教育家擔任董事，並且還規定楊氏族人不得干涉校政。所聘任歷屆校長都能秉承楊斯盛的篤實辦學精神認真教學。由於校址設在浦東鄉間，故學風純樸，全校師生受著楊氏的精神感召，都勤奮教學和受教，在自動自發的情況下努力向學。楊氏的墓園即在學校後面，我們學生時常往楊氏墓園憑弔，懷念這位偉大捐資興學的人。我在浦東中學修讀了許多數理化課程，因之對理科學業打好一點基礎。浦東中學是採取學年學分制。學生如果努力一點的話，可在二年半時間內將高中規定修讀學分念完。當時一般大學採取單獨招生辦法，除高中畢業生能應考外，凡具有同等學歷者（高二肄業期滿學生）亦可報考。因此我就是我在高中還缺一年的情況下便考入上海中法大學藥科。

中法藥科經費充裕

上海中法大學藥科在名義上雖屬私立學校，但實際上是由中法文化基金會（退還庚子賠款保管及運用機構）以及中、法兩國政府資助成立的學校。中法藥科的校舍也是國立中法工學校撥出一幢五樓大廈組成的獨立校園。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以前，中德兩國政府曾在上海租界內設立國立中德工學院。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簽訂巴黎和約中，特別規定上海租界內的國立中德工學院改為國立中法工學院。上海公共租界內部分地區

劃為法租界。法租界內的國立中法工學校校址的土地主權歸中、法兩國所共有。因此法租界當局一定要會同中國政府才能進入國立中法工學校校園（中法藥科校園自然也包括中法工學院範圍以內）。這項事件是國際間一種特殊事務和法律規定。

巴黎和約中並且規定，應中國政府要求，對於庚子賠款尚未償還部分，中國政府即停止支付。已付的賠款部分由各國分期歸還中國政府作為發展文化事業之用。依據有關「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保存的資料，說明庚子賠款的部分情形如下：

據辛丑（一九〇一年）條約原定的十三國賠款比率表，英國所得的賠款居第四位，佔全數百分之十一有零（俄國第一，佔百分之二十九弱，德國第二，佔百分之二十。法國第三，佔百分之十六弱。日本第五，佔百分之七·七三。美國第六，佔百分之七·三二。原定分三十九年付清，年息四厘。英國退還庚款案到一九二五年三月才經下議院通過二讀。原案主文是：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以後英國應得的庚子賠款得用於「教育的，或外交部長認為中、英兩國互有利益的其他用途。」原案並規定組織一個「顧問委員會」考慮何種用途於中、英兩國最有互惠的利益。

英庚款自從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以後，即保留作特別款項，不列入經常預算。從那一天算起，到預定的一九四五年庚款付清

為止。總數約有七百萬英鎊，加上歷年利息四百多萬鎊，合計全數為英鎊一千一百八十八萬有零（照當時的匯兌率，此數約合美金五千五百萬元）。依照原定分期付款表，每年可得四十八萬五千英鎊。

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均感經濟困難，所以對退還庚款事，所持態度也不一致。美國率先退還庚款，由中美雙方知名人士組成「中華文化基金會」，我方梅貽琦、胡適二氏都是委員。該會初期工作是資助幼年學生（由全國中學畢業生中考選）赴美留學。然後創辦國立清華大學，並繼續資助優秀畢業生赴美進修。這是民國初期留美學生特別多的原因。這些留美學生後來回國服務，對我國科技發展和建國工作貢獻很大。

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雖為戰勝國，但由於戰爭中人力及物力損失慘重，以致戰後經濟凋敝，財政困難。對於償還庚款事，雖有承諾，但一時無法籌得鉅額款項。於是先成立「中法文化基金會」，法方推派Eliot, Leprie, 我方推派李石曾、李書華等人擔任委員，擬定推行會務辦法是先由法國政府撥付部分款項配合我國經費在北平成立「中法大學」，另在法國里昂（Lyon）成立「中法學院（Institut Franco-Chinois）」。

部分優秀中法大學畢業生亦得派送赴法進修。派遣學生抵法後即寄宿於里昂中法學院，免費入法國里昂大學進修。

中法大學藥科是由宋梧生博士等人向中法文

化基金委員會申請在上海設立的藥學專科學校，名義上附屬於北平中法大學，但藥科的行政和經費均係獨立。早幾期前二名畢業生也由學校資送赴法進修，實際上等於是中法文化基金委員會的

獎學金名額，經由學校管道遣送的。中法藥科雖未從中法大學獲得經費補助，但由中法文化基金委員會，法國政府，上海工商界多方資助，所以經費相當充裕，宋老師擔任藥科主任，他用高薪

聘請許多知名教授，如二位外國教授都是月薪五〇〇兩（銀兩），本國教授是月薪五〇〇元（銀元），這在當時是很高的待遇，其餘教職員薪津也較其他學校優越。（未完待續）



① 作者的老長官劉瑞恆（左）抗戰時期與林可勝（右）商討後方勤務救濟工作。

② 作者（右二）與胞妹孫雲軒（左二）五弟孫雲疇（右）七弟孫雲壽（左）合影。

